

鲁迅杂文风格的另一面

[作者] 曹毓生

[单位]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

[摘要] 本文认为，鲁迅杂文风格既有如同匕首投枪，造语曲折，短小精悍的一面，还有讲究趣味，畅达明朗，从容舒展的一面。鲁迅杂文的整体风格是由这二者的对立统一所形成。如果没有趣味，畅达明朗，从容舒展这一面，鲁迅杂文是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，具有无比的艺术魅力，令人百读不厌，历久而不衰的。

[关键词] 鲁迅杂文，风格，另一面

鲁迅杂文风格的特色，既有如同匕首投枪，造语曲折，短小精悍的一面，还有讲究趣味，畅达明朗，从容舒展的一面。前者无疑十分重要，可说是处于主导地位，但后者也绝对不可或缺。鲁迅杂文的风格就是由这二者的对立统一所形成。长期以来，人们特别重视前者，无疑是对的；然而却没有注意到后者，至少是注意得非常不够。而倘若忽视了后一面，是不可能真正看清鲁迅杂文风格的全貌，不可能正确理解并有效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的。

—

对于鲁迅杂文蕴含着“趣味”的问题，朱自清 1948 年在一篇论文中曾略微涉及。他认为：“百读不厌”这个批评用语注重趣味与快感，只适应于古代文学，不适应于现代文学。也就是说，现代文学还没有能令人感到有趣味，获得快感，因而“百读不厌”的作品。但鲁迅的《阿 Q 正传》是例外，鲁迅杂文是例外。鲁迅杂文之所以如同《阿 Q 正传》一样令人“百读不厌”，是因为它蕴含着“理趣”，即“理智的结晶”，“而这也就是诗”[1]。虽然如此理解与评价鲁迅的杂文者，在当年以及后来都仅止朱自清一人，再没有第二个人哪怕是片言只语论述及此，但毫无疑问，朱自清是深刻的，他初步“解”到了鲁迅杂文之真“味”。

我国自古以来即常用“趣味”作为评诗论文的一种尺度。如齐梁间钟嵘的《诗品》即品评了自汉至梁一百多家五言诗的“滋味”(与趣味相近)，唐代司空图《与王驾评诗书》则说：“右丞、苏州，趣味澄澹，若清风之出岫。”[2]迨至现代，有一位伟人，即令在戎马倥偬的井冈山斗争的严峻环境里论教授法时，也着重强调：“说话要有趣味。”而且将这一点写进《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[3]，可见他对趣味是何等的重视。在他看来，说话要有趣味，作为说话的书面形态的文章当然更是非讲趣味不可的。

但 20 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，却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：一方面是周作人等热心追求充满闲情逸致的趣味；另一方面，颇多激进的作家则视趣味为封建士大夫与有闲之徒的专利品。在激进的作家们看来，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统统都是不讲趣味的，是排拒趣味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鲁迅如何看待趣味呢？他当然反对在“风沙扑面，虎狼成群”的岁月大肆鼓吹封建士大夫与有闲之徒的闲情逸致，但绝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趣味，相反时或以“趣味”评价艺文。譬如，他称赞陶元庆的绘画“对于笔触，色彩和趣味”特别尽力经心[4]；他欣赏外国讲学术文艺的书“使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”[5]；他引用丹麦心理学家、哲学家吉开迦尔的一段 essay 之后给以“很有趣味”四个字的评语[6]。1928 年，有人指责《奔流》“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”，鲁迅在“编校后记”中回答道：“说到‘趣味’，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，但无论人类底也罢，阶级底也罢，我还希望总有一天弛禁，讲文艺不必定要‘没趣味’。”[7]1934 年，鲁迅在《门外文谈》中说：“方言土语里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，

我们那里叫‘炼语’，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，恰如文言里的用古典，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。”[8]总之，在鲁迅看来，文学艺术是应该讲究趣味的，作为文学的门类之一的杂文当然更应如此。

不过朱自清也许是专注于鲁迅杂文的议论深刻、说理透彻的缘故，以致只说到了它所蕴含的“理趣”，而未论述到其它形态的趣味。其实，“趣味”不止于“理趣”，它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早已有之并沿用至今的一个审美范畴，是包括理趣、情趣、奇趣、意趣等许多不同的类型的。它们的共性是都能给人审美愉悦，但又各具特色。理趣是在文学作品里交融于情景之中，“带情韵以行”的“理”所具有的趣味。情趣主要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与情感相联、情态盎然的趣味。奇趣是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非同寻常的事物与行径产生的趣味。意趣则是文学作品不同凡响的立意所包含的趣味[9]。鲁迅那么大量的杂文，整的看来，是各种趣味无不具备的。譬如：《春末闲谈》首先叙述细腰蜂“用了神奇的毒针，向（青虫）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，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，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，封入巢中。青虫因为不死不活，所以不动，但也因为不死不活，所以不烂，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，这食物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”；然后，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思想钳制与细腰蜂的毒针加以比较，既揭露这种思想钳制的阴险毒辣，又指出它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，远不如细腰蜂用毒针处置小青虫那么得心应手，从而宣布了它的必将彻底破产。全文形象生动，说理透辟，融理于情，充满着发人深思的理趣。《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，叙述了自己同《语丝》之间的关系，从“呐喊”到“彷徨”，到在上海接编，然后与之分手的全过程。其间既不乏“任意而谈，无所顾忌”的痛快，更颇多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的坎坷，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也很不少。字里行间蕴含着主体的始则欣慰，继而带着几分苦涩与无奈，全文洋溢着沉郁的情趣。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中国，古怪事情很多，而有一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是：杭州城外有个教师，竟然在西湖游览区冒称鲁迅，说什么他出版了一本《彷徨》，发行了8万册，并答应给女大学生M女士以“指导”。直至M女士跟随鲁迅的两名学生一同拜访鲁迅，才知原来在西湖所见者是一个“冒称的鲁迅”！鲁迅得知此事以后，为了澄清真相，避免误会，发表了一篇《在上海的鲁迅启事》的杂文，全文仅只直陈事实，但此事确乎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之外的离奇，因而令人忍俊不禁，颇具引人入胜的奇趣。此外，鲁迅写过一篇《二丑艺术》，就浙东一处戏班子里的一种叫做二丑或二花脸的，从舞台角色特征的角度切入，将他与其它角色特别是小丑加以比较，展示出他的许多“微妙之处”。但言在舞台角色而意在现实生活，揭露了社会上那些既投靠权贵，又准备随时改换新的主子，还要遮掩帮闲本来面貌的政客型知识分子的丑态，这个融于情、渗于象的立意，实在颇富启人心智的意趣。应该申明的是，这里的分别举例仅只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，实际上，鲁迅的杂文，理趣、情趣、奇趣、意趣乃至本文未予论及的真趣、生趣、天趣等等，是往往或二者汇聚于一身，或三者以上兼而有之的，前面提到的《春末闲谈》即不只具有朱自清所格外赞赏的理趣，而是同时充满其它多种趣味的名篇。

鲁迅杂文之所以趣味盎然，主要是由于揭示了生活本身固有的趣味。此外，还因为鲁迅在进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过程中，往往出之以讽刺与幽默。而无论讽刺还是幽默，作为一种审美范畴，作为喜剧性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它通过比喻、夸张、象征、寓意、双关、谐音、谐意等手法，运用机智、凝练的语言，对社会生活中乖戾、自相矛盾、失去存在根据的事物或现象加以揭露、批评，使人们在喜剧引起的笑声中否定这些事物与现象，因而总是趣味横生。

鲁迅所重视并强调的“趣味”自有其独特品格：一是以真为基础，以善为前提，以有益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正常发展为准则，譬如有些科普作家，因片面追求趣味，将动物伦理化，以致不利于科学知识的正确传播，鲁迅对此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。二、鲁迅在回复有人对《奔流》的责难时为趣味所作的答辩，其中还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：“趣味”有时既带阶

级性，又具有人类共同性。而承认这一事实，就划清了同“左”的庸俗社会学之间的界线。三、无论全人类的也罢，阶级的也罢，鲁迅都持一种健康、高尚的“趣味”观，而对当年周作人所宣扬的“趣味”观中的封建士大夫式的隐逸气，对林语堂所宣扬的“趣味”观中的封建士大夫与洋场才子气，对吴稚晖等人“趣味”观中的低级庸俗气，都进行了必要的批评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鲁迅杂文中的趣味不仅能给人以审美愉悦，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，而且收到了同匕首投枪相反相成、相得益彰的效果。或者更准确些说，正是由于具有高尚健康的趣味，才使匕首投枪显得更为锋利，充分地发挥了它的战斗的功能。

一

对于鲁迅的行文或曰笔法，也应看到它的两面。一面是“造语曲折”或“隐晦曲折”。1925年6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，对于旧文明旧思想的“猛烈的攻击，只宜用散文，如杂感之类，而造语还须曲折，否，即容易引起反感。”[10]此处所说的担心引起反感，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接受者的思想障碍，以便更有效地发挥文章改造国民性，重铸民族灵魂的作用，这无疑为鲁迅关于杂文的一种美学理想。此外，鲁迅在统治者疯狂压迫革命舆论的黑暗社会里，确乎写过一些笔法“隐晦曲折”的杂文。这当然同“造语曲折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，而是被迫而为，旨在穿越反动统治者的文网。但不管怎么说，“造语曲折”也罢，“隐晦曲折”也罢，都仅仅只是鲁迅行文或笔法的一面，他确实还有向往并追求同“造语曲折”——更不待说同“隐晦曲折”——相反的另一面。

关于这“另一面”，鲁迅作过理论上的阐述，并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。1925年4月，鲁迅在同许广平谈到写文章时就说：“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，正不必故意减缩（但繁冗则自应删削）。例如玄同之文，即颇汪洋，而少含蓄，使读者览之了然，无所疑惑，故于表白意见，反为相宜，效力亦复颇大，我的东西即常遭误解，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，可见意在简练，稍一不慎，即易流于晦涩……其弊颇大。”[11]1926年11月，鲁迅在《写在〈坟〉的后面》也讲到他在“造语”行文方面的看法与追求，他说，因为“看过许多旧书……耳濡目染，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，常不免流露它的字句，体格来。而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，摆脱不开，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。”因而觉得必须“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，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，更加有生气。”[12]这里讲的主要是文言白话的问题，是要排除文言负面影响的问题，但显然也包含着追求行文畅达明朗的意思。后来冯雪峰回忆道：鲁迅痛惜他的小说和文章中的曲笔常被一般读者误解，所以“更倾向于直剖明示的尖锐武器的创造”[13]。此处的“尖锐武器”也是指的行文或笔法。从这些论述、总结与感慨可以看出，鲁迅确实是一直在追求“畅达明朗”或“直剖明示”的笔法或行文方式的。

鲁迅不仅从理论上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，而且在创作实践上颇为留心，因而收到了可观的效果。虽然，“造语曲折”一直是他常用的一种顾及接受者的心理因而含蓄婉转的行文方式，一直是他杂文创作的一项美学追求，虽然万不得已之时仍间或出之以“隐晦曲折”，但是，“畅达明朗”或“直剖明示”的行文方式在他的杂文创作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，有的时候甚至居于主导地位。鲁迅运用这种笔法所作杂文在他的杂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，如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、《答中学生杂志社问》、《官话而已》、《谈金圣叹》等等，就都是。“好个国民党政府的‘友邦人士’！是些什么东西！”这实在是够明白的了。再说，象《伪自由书》与《准风月谈》的两篇很长的《后记》那样的杂文，并无什么曲笔，可说是和盘托出。至于象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途的血》等在地下刊物登载的，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》等在国外进步刊物发表的，还有那篇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的内部论争的长文，造语毫无曲折，也不怎么含蓄婉转，而是相当地道的畅达明朗或直剖明示的笔法了。

三

人们在论及鲁迅杂文的篇幅时，往往众口一词：短小精悍。一般说来，自然没有错。但严格推敲，也不无片面性。固然，鲁迅说过，他“好作短文”；他也提倡别人写作短文；他很多时侯把杂文叫作短评；他间或把他的杂文集称之为短评集；他确实写了大量的几百字到千字的短小精悍的杂文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，另一方面，鲁迅也提倡过写作长的杂文，且自己动手写出了许多长文的名篇。

鲁迅在《杂谈小品文》中明确指出：“篇幅短并不是杂文的特征。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，一部《老子》只有五千言，都不能说是小品。”[14]鲁迅在《二心集·序言》中说：“自从1931年2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，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，就很少做《热风》那样简短的东西了；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文字的批评，得了一种经验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，是极容易遭到无意的误解，或有意的曲解似的。”[15]鲁迅还曾劝说唐弢，叫他除“千字文”以外，也写些较长的杂文，并解释道：杂文“作为思想斗争或者文艺斗争的武器，最好写得从容舒展一些，列举事实，多加申说，稍为长点也无妨”。唐弢听从先生的意见，写了一系列较长的杂文，并说：“有人偏爱它们，说是这个写法好。”[16]可见受到鲁迅影响而作长杂文或赞成长杂文者亦不乏其人。至于鲁迅自己所写的长文那就更多了，熟悉鲁迅杂文的读者是谁都能够很容易地举出一连串的篇名的，如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、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、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等等。还有那篇《由中国女人的脚，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，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（“学匪”派考古学之一）》，不仅文章相当长，就连题目也长达35字之多！若就篇幅与文气审视，这些杂文所呈现出的特色就不是短小精悍，而是从容舒展了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，鲁迅关于杂文的主要的美学理想是：就思想艺术整体而言，力求战斗性与趣味性的相互交融。具有战斗性，杂文方可在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中发挥匕首、投枪、显微镜、解剖刀的多种功能；具有趣味性，杂文才能生动活泼，能移人情，能给人愉快和休息，以做好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。就笔法而言，是造语曲折与直剖明示的对立统一。造语曲折，则语意含蓄委婉，可减少接受者感情上的障碍（即避免引起反感），且令人读来饶有回味的余地；直剖明示，行文畅达，含意明朗，作者旗帜鲜明，读者易于理解。鲁迅在创作实践中，前后两种笔法兼容者有之，或侧重前者或突出后者也有之，均主要依时空与语境为转移，当然同主体心态亦不无关系。就杂文的篇幅而言，既好作短文，也讲究写长文，全视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所处的历史背景而定，该短则短，应长就长。短文短小精悍，长文从容舒展，各有特色，各尽其妙。试问：如果只有赤裸裸的战斗性，而没有趣味性与之交融，只有一味的曲折含蓄，而没有直剖明示与之对立统一，只有几百或千字的短什，而没有长文与之互补，那么，鲁迅杂文怎能具有如此无比魅力，气象万千，丰富多彩，既能短兵相接，又可从容论道，因而令人百读不厌，历久弥新呢？

注释

- [1] 朱自清《鲁迅先生的杂感》，《知识与生活》1948年5月6日第26期。
- [2] 司空图《与王驾评诗书》，周祖撰编《隋唐五代文论选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至395页。
- [3] 《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东北书点1948年版第574页。
- [4] 鲁迅《〈陶元庆氏西洋绘画目录〉序》，《集外集拾遗》。

- [5] 鲁迅《忽然想道(二)》，《华盖集》。
- [6] 鲁迅《帮闲法发隐》，《准风月谈》。
- [7] 鲁迅《奔流编校后记(五)》，《集外集》。
- [8] 鲁迅《门外文谈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
- [9] 成复旺主编《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辞典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95 页。
- [10] 鲁迅《两地书》三十二。
- [11] 鲁迅《两地书》十二。
- [12] 鲁迅《写在<坟>的后面》，《坟》。
- [13] 冯雪峰《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》，转引自朱自清《鲁迅先生的杂感》。
- [14] 鲁迅《杂谈小品文》，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
- [15] 鲁迅《二心集序》。
- [16] 唐弢《我与杂文》，《文化名人自述》群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6 页。

http://www.chl.hbnu.edu.cn/xszl/detail.asp?n_id=337